國際政治經濟文化週刊

世界知識

第十九卷 第五期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廿九日出版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第四五七號 上海市社會局核准登記 本埠上海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五洲書報社
本社叢書一律按基價八倍計算
本刊每逢星期六出版

瞭望臺

「引退」

一月二十一日，蔣總統突然宣佈「引退」，當即飛杭轉奉化休養；二十二日，副總統李宗仁代理總統職務，發表「謀取和平」的文告；孫內閣決定派遣邵力子、張治中、黃紹竑、鍾天心、彭昭賢等五人爲和談代表；二十三日，北平和平協議生效，共軍入城；李代總統又宣佈了取消全國戒嚴令（接近前線者除外）、釋放政治犯等七項措施。一周之中這一連串的變化，驟看像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灣」。但全國人士的「心理反應，有如出了氣的啤酒，始則熱烈，繼則平淡。」（二十二日大衆晚報）

蔣總統的去京，曾引起中外輿論紛紛不一的揣測，因爲他的離別文告中並無「去職」或「辭職」字樣，且接替他職務的仍用「代總統」的名義，可知他的「引退」，至少在主觀上是暫時的，並無「一去不復返」之意。可是「引退」兩字，要譯成英文，卻便難了。外國報紙有的譯"goes"有的譯"retire"，都未盡切合。按「辭海」解釋：「引退，致仕也。蘇東坡詩：『見公奔走謂公勞，聞公引退謂公高。』」東坡的詩句極盡幽默，倒是道出了「引退」的眞義，蓋含有「雖退亦進」「以退爲進」之意。所以有人把「引退」譯作"steps aside"，似更適合。

事實亦可證明這樣的解釋。據外電所傳，「大批通訊器材已運奉化」，可知蔣總統雖閒居故里，仍與南京保持密切接觸，無異處身首都。新聞局長沈昌煥直率談稱：「蔣總統並未辭職，李氏僅係在蔣氏離任而未能視事時代行其職權。」（二十四日聯合社電）

絕非偶然

蔣退李代，雖說根據了憲法第四十幾條

若問實在的動機何在，那末請看一看今天戰場上的變化，聽一聽美國的輿論，或更進而留心一下美國幕後的活動就好了。

孫內閣曾自稱最能「反映美國的觀點」，實際上，最能反映美國觀點的，當莫過於這次「蔣退李代」的一幕了。據傳有一位官員對於「引退」深致慨歎，對人說：「美國的壓力實在太大了！」

如果大家不健忘，當記得副總統競選時，若非山姆叔從各方面支持，李氏怕很難登上副座的。李氏上台後，一直閒散無事，若有所待。每遇一次局勢變動，便謠傳一次李氏如何如何。現在，這着棋子終於應了驗，可知絕非偶然。

蔣退李代，機構固然原封未動。但內部的矛盾自然是有的。極端保守派反對這一着，有幾位政務委員掛了冠。不過大勢危迫，在此一舉，何況還有華盛頓的壓力，自然只有這麼辦了。

「緩兵之計」

佈置不可謂不周的。在蔣氏引退的前夕，政府曾發表了大批重要的新任命。計陳誠爲台灣省政府主席，張羣爲重慶綏靖公署主任，薛岳爲廣東省政府主席，余漢謀爲廣州綏靖公署主任，張發奎爲海南特區行政長官，

目錄

瞭望台
「引退」——絕非偶然——「緩兵之計」——疾進——兩種競賽——亞洲會議閉幕——日本衆院選舉揭曉
舊秩序的崩潰……………………………………俞 衡
杜魯門就職演說讀後感……………………………慕 松
杜魯門的「新政」與經濟危機………………………筍 一
充份就業就能消滅經濟恐慌嗎？……………………葉嘉樹譯
羅馬尼亞底教育改革…………………………………馬嵐譯
一週外論輯要……………………………………………小 宜
共產黨的答覆——毛澤東的聲明——中共的和平條件
——蔣氏的引退——新中國出現了
台灣：避難之島？……英・Economist 周刊
「日韓紀行」（書的世界）………………………葵 軍

編輯人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者 王德鵬
社址 上海(〇)河南中路八十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五三九三四二

自由定戶訂閱辦法：請先付定費一百五十元（航郵另加二十元）每期發刊時按本刊定價七折貿扣，款盡另函通知定戶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戶號碼

朱紹良爲福州綏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方天爲江西省政府主席，邊陲遠地，都安置了親信的重鎭。

李代總統在二十四日中央紀念週中亦表示：「如果共黨不顧言和，我們已經準備好了下一步驟」。據二十五日報載，李氏已電令白崇禧調兵五萬到南京。

凡此種種，跟速日報紙盛載的「祥和措施」，交錯構成了表裏輝映色彩鮮明的圖畫。二十二日「前線日報」力勸「共黨可不必憂慮政府之求和爲緩兵之計」。可知共黨確乎認定這乃是「緩兵之計」的。

疾進

戰場上的形勢急轉直下。北平自二十二日和平協議成立後，已於二十三日「兵不血刃」地易了手。歷史的故都完成了歷史的轉變。

在另一方面，陳毅的大軍兼程疾進，江北國軍紛紛撤守。當本刊付印時，共軍已到臨江邊，首都已在其大砲射程之內。廢曆年關聲中，石頭城已面臨「大軍壓境」的危局了。

李濟深等五十五人於二十三日發表宣言，認爲「政府的和平主張乃雙管齊下的政治陰謀。革命與反革命之間，決無妥協調和的可能。」最後又說：「我們對於蔣美所策動的虛僞的和平攻勢，必須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毀。人民革命必須繼續到底，人民革命完成的一天，便是和平來到之日。」（二十三日合衆社電，見二十四日新聞報）。

由此看來，政府雖努力想以「和談」爭取喘息的時間，但對方可不允許給政府以「喘息的時間」。

兩種競賽

政府已不得不放棄原來「先停戰，後和談」的原則，「和談」的政府代表邵力子張治中等已整裝待發，連日到滬，訪晤孫夫人黃炎培等商談，迄今尚無結果。中共方面已表示可以進行談判，它的態度可從其發言人二十五日的聲明看出來，這聲明說：「我們願意在一月十四日毛澤東主席對時局聲明的基礎之上，和南京反動政府談判和平解決問題，我們允許南京反動政府派出代表和我們進行談判，不是承認這個政府還有代表中國人民的資格，而是因爲這個政府手裏還有一部份反動的殘餘軍事力量，如果這個政府感於自己已經完全喪失人民的信任，感於它手裏的殘餘的反動軍事力量已經無法抵抗强大的人民解放軍，而願意接受中共的八個條件的話，那麼用談判方法去解決問題，使人民少受痛苦，當然是比較好和有利於人民解放事業的。」（二十五日中央社電）

香港大公報曾用八個字指出目前形勢的特點，說一方面是「以和養戰」，一方面則是「以戰求和」（見一月二十四日出版「展望」周刊）。

就某一點說，現在可說是「以和養戰」跟「以戰求和」的競賽。這競賽的結果雖還未揭曉，但看目前「秋風落葉」的情形，有一點已經可以斷言的：中國眞正和平的實現，就在眼前了！

亞洲會議閉幕

亞洲會議已於二十三日閉幕了。尼赫魯在閉幕辭中稱頌「會議的意義偉大，爲遠東各國間合作的先驅」。

但實際上，「偉大」在什麼地方呢？是爲了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制度麼？是爲了弱小民族的解放麼？

這次會議是借了印尼問題的幌子召集的，但這個幌子無法遮掩它的本質。第一，召集人本身便是大英帝國的一個自治領的總理；第二，蘇聯的亞洲部份各共和國和越南人民共和國都未被邀請；第三，這次會議召集的動機可說是美國授意的。合衆社有一則電訊說：「組織東南亞集團的首次跡象，起於今年十二月下旬，當時印尼駐美代表曾訪晤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大使，交換因荷軍進兵印尼所引起的後果」。美國從中牽線，昭然若揭。

這次的亞洲會議，決不能說是「遠東各國間合作的先驅」，如果要說「先驅」，那只不過是美英策動中的東方聯盟的先驅而已。

日本衆院選舉揭曉

日本衆院選舉已於二十四日揭曉，選出衆院議員四百六十六名，結果如下：

民主自由黨	二六四席
民主黨	六九席
社會黨	四九席
共產黨	三五席
協同黨	一三席
勞農黨	七席
社會革新黨	五席
其他	二四席

這次選舉結果的特點有三：一，吉田領導下的反動的民自黨，獲得了勝利，該黨在上屆議會中僅佔一百五十二席；二，共產黨表現了空前的躍進，它在衆院中獲得三十五席，較前屆的四席竟增加九倍，已從第十位一躍而爲議會中的第四大黨；三，片山哲領導的社會黨一蹶不振，竟從前屆的一百十一席降爲四十九席。

據東京的觀察家指出，反動派的勝利，係麥帥政策所促成。共產黨顯著的成功不容忽視，「因現已獲得三十五議席的日共，將與已獲得六議席的新成立的農工黨合作，如此則極左翼各黨將在議會佔四十席，雖則反動派在議會佔絕大多數，極左派亦必成爲議會極活動的反對黨」。日共書記長德田二十四日演說稱：「日共將在下屆普選中成爲日本的第一大黨。我們是日本的解放者」。

本刊春節休假啓事

茲以新春佳節，印刷工友休業，本刊亦循例自下期起休假，俾以整理內部，敬希　讀者公鑒

世界知識社謹啓

更正

上期本刊「賽珍珠的高見」一節中最後第二行首句「志願來了又去了」。按「志願」二字係「主義」之誤。

舊秩序的崩潰

俞衡

一

早在去年九月間，當援華問題在華府嚷得最熱鬧的時候，美國衆院外交委員會中共和黨代表鮑爾登與周以德等便在其草擬的關於中國問題的報告明白指出：「中國的命運將決定東南亞的命運，最後將決定全世界的命運。」（法國新聞社華盛頓一九四八年十月三日電）這種論調一時曾成爲所謂「死硬派」（包括美國的以及其他各國的 die-hards）大聲疾呼的論據，似乎除了美國挺身而出直接動手來挽救這「命運」外已經沒有第二條路了。

記得張羣訪問日本之前及其後，「遠東防共集團」的喧嚷早已盛極一時。例如美國，「在衆院外交委員會頗具聲望的伏伊斯即主張一整個的遠東復興計劃，包括中國、日本、朝鮮、印度及目前有共產黨積極活動的東南亞殖民地區域在內。伏氏認爲，美國出資的復興計劃，必須避免馬來亞、法屬安南及荷屬諸島諸地『殖民制度的崩潰』」。（合衆社華盛頓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六日電）

然而，半年來的時間不是白過的。尤其是中國，目前的形勢比了張羣訪日高唱「大東亞共榮圈」翻版新腔的時候，確乎已經面目全非了。即使東南亞也已非半年前的東南亞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新共和」上刊載了一篇勃立格斯（W. L. Briggs）所寫的香港通訊，題目是：「亞洲的舊秩序崩潰了」；這似乎說明了形勢的發展已經出乎伏伊斯之流的意外地快。雖然周以德還在力竭聲嘶地叫喚說，「還不算遲」，但華府的主要趨向却不得不變成「旁觀」了。

上述的通訊的副標題是：

「被歐洲的死硬派的錯誤煽旺了的共產黨的火焰橫掃着東南亞。」

的確，到處是火焰！一向在東方保有着特別權益的强國，對於這些狂焰中的栗子，已經到了眼睜睜無法措手的地步。對於中國，美國不得不暫取「旁觀」「待變」的姿態，英國（在相當程度內也代表了加拿大與澳洲）則簡直在考慮進一步跟共區恢復貿易關係了。對於東南亞，則英美還想做其防止「崩潰」的工作；現在正策動着印度的民族叛徒尼赫魯，頂着已經在歐洲與中國破了產的所謂「中間路線」的爛招牌，召開所謂「亞洲會議」，企圖以此來廝拚東南亞各民族的殖民地翻身運動，俾達防止「殖民制度的崩潰」的目的。然而正如勃立格斯在上述的通訊中指出，「實在已經太遲了」。

因此，從中國乃至整個東南亞形勢來看，不僅對中國，即對東南亞各國，英美也不得不考慮如何在執行其至死不變的防共政策上改變其方法。

二

勃立格斯在其通訊的結論中曾向美國政府提出了認爲可以實行而且應該迅速實行的建議；該項建議包括：

一、「我們必須幫助土人們獲得更大的經濟安全。在所有五個國家中（按即指越南、緬甸、馬來亞、暹羅與印尼——作者註）人民都在大戰中受難，而且除了暹羅以外各國仍繼續受着難。只要殖民地的摩擦在越南與印尼存在一天，各地米糧的缺乏將繼續存在的。這些國家正要求着關於農業的顧問、社會福利、政府機構與工業。他們需要政府與私人的貸款。

二、「我們必須提醒法國人與荷蘭人，妥協是必要的。我們必須勸信他們，他們將從舊秩序收穫到極少利益的。我們必須使他們瞭解，爲了全區的經濟發展並且爲了阻止共產主義的生長，和平是必要的。

三、「除了有效地表演出我們是爲了自由、民主與豐滿的飯碗以外，我們必須給東南亞人民以書籍、教育影片、講師、獎學金——將西方民主與蘇聯的生活作比較的種種方法。

四、「我們應該配合聯繫盟國的計劃與防禦，並且加强我們的情報。我們應該將關於共產黨技術的情報以及跟他們鬥爭的方法供給那需要這些的本地政府。英國人早已配合聯繫着他們的東南亞計劃，特別關於共產黨的。」

這些建議是值得玩味的。這些建議並不是寫通訊者的「紙上談兵」的建議，其實倒是非常現實的。而且只要稍些聯想一下的話，不難看出，華府若干「有遠見」的人士早已不止一次地對中國問題提出了跟勃立格斯相

倣的意見了。眼前便是衆所週知的上海英文大美晚報所說的「留下來，大有文章可做」的話頭，或者像「賽珍珠的高見」：

「……假如美國送食物到中國去救濟飢荒，派技術人員去恢復交通，作種種工程設計以增加食物和製成品的生產，美國就可以贏得中國人的心，不論中國的新政府是一個怎樣的政府，他也必然會心領的。新政府會依賴美援，在他能獨立經營時，已經被美援納入模型中了。

「……因爲美國的物資和技術還是可以產生效力，使中國人自已決定起來反對共產主義思想的。」（「聯合國世界」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號）

好得很。這些華爾街幫閒的謀臣策士都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人民看作窮得眼睛發花了，都像狗一樣的下賤，「有骨便是主，有奶便是娘」了。他們留下來要做的文章便是如此。

當然，他們也不會傻得專靠這些方法；他們同樣還用了別的方法。

三

還有什麼文章可做呢？

據路透社匈牙利京城一月十九日電，匈牙利政府曾發表了「黃皮書」，公布了大主教敏治申第（Mindszenty）案件。該大主教係犯顚覆現政府的叛國罪而被捕，將交法庭公開審問，屆時將歡迎外國記者旁聽。

「黃皮書」曾引述該大主教的自供說，他自認是匈牙利貴族，他的目的，過去曾是，現在還是「在歐洲專制皇朝中的復辟運動的目的，以個人來結合匈牙利與奧地利，並與其他天主教國家相結合，首先可能參加的是巴伐利亞，而以哈潑斯皇室的奧托（Otto von Hapabury）居王位。

敏治申第還說：

「我想只有經由外國的，首先是美國的援助推翻匈牙利共和國之後這才是可能的。

「對這個具有了興趣，我才盡其一切來支持美國在匈牙利的政治活動，一部分藉着我的反對匈牙利共和國的活動，一部分則以經常的情報與間諜工作來經常地要求國際干涉。」

他並在自供中說，他「期望第三次世界大戰在美國的勝利中結束以後，便可以復辟了」。他曾經在美國和奧托與其母廢后麗妲說過；並且據敏治申第的秘書柴卡博士供出，紐約大主教史貝爾曼對於這事的經過以及復辟計劃也是知道。當時奧托曾建議，他和敏治申第的經常關係應該通過了匈京的美使館而建立起來，特別須與新任美使賈賓聯繫起來，而且奧托已經把敏治申第在匈牙利的任務通知過賈賓了。而且敏治申第和他的秘書還有美使及其他美國代表（包括新聞參贊與一秘書）已經在敏治申第的家中會晤過幾次了。在第一次會晤時，賈賓曾「使其瞭解，如願離開本國，他們一定協助」。後來，由於狄托事件，更增加了敏治申第的活動。在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發表以後不久，敏治申第跟美使便在使館中會晤，當時在座的還有一個勃朗先生，據說是美國務院派在中歐的代表，剛從南斯拉夫來的。

* *

這便是留下來做出來的文章。

*

舊秩序在崩潰。特權强國們，尤其是美國到了無法防止其崩潰時，他們便不得不採取更「現實的」態度，他們便必然在旣定的政策的原則下找尋更「現實的」方法。他們將在躊躇一番以後，在無可奈何中承認新秩序。他們之所以承認這「現實」，祇是爲了要留下來做文章。他們文章的主題是，留在新秩序中，建立起一個更新的秩序來。而這個更新的納入美國模型的秩序却正是已崩潰的舊秩序的恢復。

杜魯門就職演說讀後感

慕　松

一

一月廿日，杜魯門開始其新任期，就任美國第三十二任總統，同時在就職演說中對共產主義加以公開而冗長的譴責，並與美式民主政治逐點相較，深信必能戰勝共產主義。

開年以來，杜魯門已經發表一連串文件：一月五日提出聯邦咨文，七日提出經濟問題的特別咨文，十日提出一九五〇年度預算咨文，到廿日發表的就職演說，與前三者構成了美國內外政策的重要聲明。根據美國的法律與習慣，這裏面的建議、提案與意向經國會接受以後，就成爲聯邦政府的行動的計劃。所以我們不能當作「例行公事」而忽視的。

對於以就職演說爲頂點的一連串政策聲明，我們最直接的印象是，去年十一月大選，美國人民投了廢票。杜魯門並沒有帶來社會改革和國際和平。在競選期間，杜魯門剽竊進步黨綱領，提供天花亂墜的諾言，保證要皈依羅斯福的路線，而咨文提出以後，聲調顯然改變，等到就職演說發表，諾言暗中偷換。這絕不是「羅斯福第五次當選」（英國「新政治家與民族」周刊社論），又一次證明美國兩黨制度是一個圈套，美式民主是一種騙局，人民對於他們選出的總統與國會並無有效的控制辦法。

二

杜魯門的就職演說中幾乎完全忽視內政問題，這是第一個特點。他大肆鼓吹美國生活方式與生活信念，他說：

「……我們相信所有的人有權享有平等的正義，在法律和平等的機會之下，分享共同的福利。我們相信所有的人有思想和表達自由的權利。我們相信所有的人生來是平等的，……我們對於這個信念，決不會變動。」

這一段話所透露的政治民主的信念，原是美國政治的優良傳統，許多偉大的先驅者爲其眞正實現而艱苦奮鬥，但這並不是今天的實際，連杜魯門也無法全部掩飾美國醜陋的眞面目。他曾在聯邦咨文中指出：「我們正爲過高的物價叫苦，我們的生活還不夠滿足我們的需要，我們最低的工資還是太低。小企業向滋長的獨佔企業低頭，我們的農民仍然面臨着一個不穩定的未來，……五百萬個家庭還居住於寒窟與陋巷之中，三百萬個家庭與別人共居一室，我們的健康狀況還落在醫學的進步之後，適當的醫學的調治是這樣的昂貴，以致我們極大部份的人民不能獲得這種調治。在許多地方我們的學校完全不能適應需要。我們的民主理想常被僻見與偏執所妨礙」。杜魯門咨文中不夠坦白的自訴，已經使就職演說中的大言不攻自破。大言欺世的目的，自然是要使希望杜魯門帶來革新與和平的選民們安靜下來，接受新總統的四年統治。

事實上，美國內政上不是沒有迫切的問題等待解決。杜魯門只是不願觸及他在競選中所曾熱烈爭論的問題。舊事重提，諾言必需兌現，而在杜魯門看來，那些不過是選舉年的口惠而已。例如，對於塔虎脫——哈特萊法案，杜魯門曾保證全部廢止，但在咨文中却提出保留的意見：「對於公衆利益有關的重要工業，應該設法解決或防止工潮」，「關於工會管理問題的罷工和不合理的抵制，應予以禁止」。這種要求爲美國統治階級大開方便之門，即在塔虎脫——哈特萊反勞工法廢止以後，它的精神還能在其他法案裏借屍還魂，勞動者的民主權利依然有被踐踏的可能。對於社會福利的增進，諾言似水，已付東流。在其所提預算中，直接用於軍事的款項規定爲一百四十二億六千八百萬美元，比上年度增加二十五億美元，同時僅以二十四億美元撥充社會福利和保健經費，四億一千四百萬美元充教育經費。這種畸形的分配，足證杜魯門對於養生樂生的興趣，遠不及使美國人民喪生的興趣大！對於美式民主的讚揚，最重要的目的，在於美化美國醜陋的現實，以便對成立人權法案怠工，不願進行任何反對種族及宗教歧視的鬥爭，毫無保護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誠意，一味用空言來撫慰通過選舉所表現的人民的感情，將他們的注意力從眞正的問題上轉移開去。這作用正和鴉片一樣。

在對內政策上，就杜魯門所表示的意見看來，民主黨不僅並不急於履行諾言，而且要將曾對美國人民提供的諾言一筆勾銷。

三

杜魯門的就職演說充分顯示將繼續執行積極備戰和征服世界的政策，這是第二個特點。美國人民是愛好和平的，最不喜歡的就是戰爭。杜魯門一面深感此種情緒之強烈，一面又利用這強烈的愛好和平的情緒來掩蓋其積極的備戰活動。他強調美國人民對和平的希望高於一切，表示並不需要戰爭，和平能夠實現，他同時却暗示獲致和平的方法首先是保持自身的強大，並提出四點贏取「冷戰」方案：（一）支持聯合國；（二）全力支持歐洲復興計劃；（三）擬定聯防協定，給予軍事援助；（四）開發生產落後地區。拆穿了講，和平是名，備戰是實，靠模倣進步黨口號當選的民主黨總統，其結果必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杜威的政策一樣，假保障和平之名，行擴張侵略之實。

馬歇爾去職阿契遜繼任之初，由於繼任者不是軍人，在有些人的眼中燃起了希望。例如紐約明星報（New York Star）就表示這樣的意見：

「人民對於國務卿的更動抱有希望，此時要壓低這種希望是不可能的，制止此種希望的活動很多，有人要求杜魯門總統宣布國務卿的更調並不是說對蘇聯軟化。……但人民並不希望一個不變的外交政策，相反的却希望外交政策能一變。」

可是，馬歇爾的辭職沒有爲美國打開一條追尋和平的道路，外交政策基調根本未變。在杜魯門的演說中，所謂「繼續予聯合國以毫不猶豫的支持」，恰切地說，只是繼續利用多數，把聯合國當作一個簡單的表決器，便於通過便利對外擴張干涉他國獨立的提案。四點方案的重心，則在繼續支持馬歇爾計劃與組織大西洋聯盟兩事。我們知道，馬歇爾計劃只是更進一步的杜魯門主義，這兩者配合成一套周密的向外擴張與對外干涉的侵略行動。這都是專替妄想統治世界的美國獨佔資本家打算，結果必然引起戰爭！而所謂大西洋聯防談判，乃是欣然迎接戰爭的軍號，與爭取和平是風馬牛不相關的。所謂開發世界落後地區，又不過是擴大馬歇爾計劃，加緊掠奪物資，儲備特種原料。在這種高度的軍略性措施之下，受援國家自將獻其所有，受援國的殖民地也要被搜括殆盡。如此，一面可以制止他人出而競爭，使美國獨占資本家把一無顧慮地來支配世界經濟，同時美國控制了軍需工業所需的原料，又可建立備戰經濟機構，以便從事侵略。西歐受援國家很多是擁有殖民地的，通過擴大了的馬歇爾計劃，就毫不費力地取得它們的眞正管制權了。這麼做來，就正是杜魯門所說的，「繼續保持本國的繁榮與自身的強大」的計劃。

這四點方案實際上是齊頭並進文武兼施的備戰方案。據杜魯門說：「在未來的年月中，我們對於和平與自由的政策將着重這四個主要的步驟」。我們相信他沒有說謊，其實在聯邦咨文與預算咨文裏已顯示了基於軍略性考慮的對外對內政策，一心一意要用武力做政治經濟侵略的後盾。

在聯邦咨文中，杜魯門說：「在我們所能依靠的世界安全制度尚未建立以前，我們不能逃避維持強大武裝部隊的責任，……普遍的軍事訓練，對於美國的安全是必要的。」

在預算咨文中，杜魯門說：「預料國防計劃經濟必要的增加，將使一九五〇的歲出增加二十五億美元，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廿一。」「在一九五〇年的預算中，猶如戰爭結束以來所有的預算一樣，我們的國際和國家防禦計劃佔據着重要的部份。預料這些計劃所佔的數額，將達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或全部預算支出的一半。」

由此看來，美國在承平時代，從沒有像現在這樣積極備戰的了。杜魯門所提的一九五〇年預算中，一大半是供給軍事需要之用的。單就直接用於軍事的撥款來說，一九四九年度有一一、〇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佔全部預算的百分之廿八，而一九五〇年度爲一三、五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又增加了百分之廿一，而將來對參加所謂大西洋聯盟的各國和由美國武裝的各國供應作戰物資所需的款項，尙未包括在內。這可見美國已經朝着備戰狀態跨一大步了。

龐大的軍費支出，既對於亟求安定的世界刺激很大，又足以造成通貨膨脹的惡化。一面高喊抑低物價，一面執行戰爭政策，那是根本沒有效驗的自欺欺人之談。華萊士說得好：「總統所提出的關於內政的改進和革新的建議，與他的外交政策直接抵觸。我國一日推行着這樣的方針，把我國的物力和人力都爲了軍國主義化和擴軍的龐大方案而浪費掉，那麼，美國人民的繁榮與安全就無法獲致。從總統的咨文中很清楚的看得出來，他意圖繼續加緊冷戰。這一點已表現得很明顯，他反對要求實施普遍軍訓，要求組訓美國青年以準備戰爭。」

這就是杜魯門的對外政策的基調，依舊是按着福萊斯特——馬歇爾——范登堡的譜子吹奏罷了。

四

一九四八年大選給美國人民將留下深刻的教訓。他們不大熟悉複雜的政治情勢，在無可奈何的心情下抉擇了杜魯門，希望從內政到外交都有一番改革，但是他們受騙了。華萊士在兩年前已不幸而言中，他說：「民主黨將較共和黨發出更爲美麗動聽的口惠，可是它們的動作，在實質上將並無差異。杜魯門總統在二年前所發表的國內形勢咨文，其中就包括了一個健全的新政方案，而當時的國會雖然還在民主黨的控制之下，咨文的主要部份却沒有被制訂成法律。我斷定杜魯門在選舉年中所宣佈的方案將遭遇到同樣的命運」。這教訓中最大的一個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投票政策的破產。政治上「小害爲佳」的便宜主義，除了能換來兩個老黨的選舉年口惠之外，必然一無所得。現在，杜魯門就職了，他的諾言却沒有兌現。實際政治生活是最好的老師，它指出美國人民的福利絕不是可藉選舉任何程度的禍害而得增進，必須立卽組織自身的力量，爲實現他們去年十一月大選時所擁護的對內對外政策而奮鬥。

杜魯門的「新政」與經濟危機

笥　一

「以大砲換牛油」

杜魯門在他連任白宮主人的第一天，面臨着國內經濟嚴重的不穩定及其擴張政策破壞下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危機。

緊迫的情勢，使杜魯門猥猥的內心，喚起了「新政」的游魂。第八十一屆國會被大言不慚的稱爲「新政國會」，杜魯門也裝作具有無限的信心與魄力來踐行他向選民提出的「新政」諾言，如恢復華格納勞工法案呀、管制物價呀、擴大社會安全呀、制止通貨膨脹呀……等等。好像杜魯門十分現實的預感到他正在處於故羅斯福登台當年的經濟暴風雨中，必須仰藉「新政」所曾激起的安定力，以渡過新的暴風雨。

在對外經濟政策上，杜魯門於極口胡吹「美國對於西歐國家的援助，以及美國在西歐國家內所鼓勵的自助互助，已經在經濟復興和政治穩定方面產生了相當進展的效果」以後，竭力主張繼續維持惡名遠颺的「馬歇爾計劃」，並要進一步以龐大軍事計劃，武裝西歐，以支持「自由」「安全」。同時，居然提到了發展落後國家經濟的重要性。

然而，正如華萊士所指出的：「總統所提出的關於內政改進和革新的建議，與他的外交政策直接牴觸。我國一日推行這樣的方針，把我國的物力和人力都爲了軍國主義化和擴軍的龐大方案而浪費掉，那麼，美國人民的豐饒和安全就無法獲致。」

這是一個矛盾。其實，更基本的矛盾，是貫穿在杜魯門的全部「新政」的方案之中。杜魯門的「新政」，澈頭澈尾只是一件虛僞的外衣，用以掩蓋其犧牲人民利益、瘋狂備戰與對外擴張的激烈步驟。例如，一方面要求取消塔虎脫——哈特萊反勞工法案，同時又保留對重要企業方面罷工的禁止，並主張凍結工資；所謂管制物價，僅限於若干物資的選擇性的限價，而不是恢復過去有礙於獨佔資本獵取高利潤的全面管制；用於反通貨膨脹的增稅，不敢提到徵收獨佔資本的過份利得稅；所謂擴大社會安全及建屋教育衞生等，其規定的經費僅佔總預算微不足道的數目。但相反的，直接間接用於國防及對外擴張的經費，要佔到總預算的一半以上。

顯然地，杜魯門是在忠誠地爲華爾街服役，以巧妙的「新政」攻勢，強迫人民「以大砲換牛油」來挽救其國內外的經濟危機。

火藥味的預算

今後杜魯門的內政外交政策，最清晰的暴露在他向國會提出的「承平時期最龐大的預算」中。杜魯門在預算案中說：「美國的責任，是重大的，因此，美國政府的預算也是龐大的。這個預算反映了我們在國際上的現實地位，以及我們對一個進步而健全的國內經濟的關切。」

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止的新年度預算中，規定歲出爲四百一十九億美元，比上年度的支出超出十七億美元；而新年度的歲入，爲四百一十億美元，估計財政赤字將達八億七千三百萬美元。另外要增加稅收四十億美元，其用途並非主要地用於「減輕國債」、「減輕通貨膨脹的壓力」，而是爲了「應付緊急事態」，包括將要專案提出的武裝西歐的支出在內。

在龐大的總歲出的預算中，國防費用爲一百四十三億美元，佔全部預算三分之一，較一九四九年度增加二十五億美元之多。序文中說：「爲維持目前的方案而需要的國防支出，預料在一九五一年將更見增加，這是因爲擴張的計劃，目下正在着手進行，而且大批定單業已發出，訂購飛機、船舶及其他的材料和設備，這些東西在今後數年內將交貨，並需付款。」

實際上，預算中規定用於國防費用的還不止此數，還有所謂「開發天然資源，包括原子能在內」的十九億美元，「交通運輸工具及服務（其中有若干項是維持國防工作所必需的）需款十六億美元」。此外，還應該估計到軍事工業的擴張中，可能還有一大筆的政府或官方銀行的投資。所以，新年度美國直接間接用於擴充軍備和軍火工業的經費，將近現行總預算的一半了。

另一主要的支出，是所謂「國際事務及援外費用」，列爲六十七億美元，其中「馬歇爾計劃」項下經費爲三十八億美元，對華特別援助四千九百萬美元，援助南韓、希臘、土耳其（中國可能分潤一部份）三億五千五百萬美元。這一總費用，較上年度減少五億美元，其中援歐減少一億美元，對華援助激減最鉅，自三億八千萬減到四千九百萬美元。但是，杜魯門聲明另外還將專案提出武裝西歐的經費，數目多大，尙未確定，恐在數十億之譜。所以，新年度美國用於對外擴張和武裝國外的經費，將比上年度大得多。就是說，美國將露骨的以軍事援助代替經濟援助，來支持其大規模的重建和擴展軍事工業的計劃，藉此爭取更大的國外市場，解救經濟的危機。

既然大部份的預算，將化費在世界性的備戰和軍國主義化的用途之上，那末，留下來的能夠用於「新政」項下的經費，就必然的十分可憐了。預算中規定社會福利、衞生、安全等方面的經費，爲二十四億美元，佔總預算的百分之五・七。另外用於房屋、教育、勞工、金融、商業及行政費用方面的，總計二十三億美元，也僅佔總預算百分之五・四。杜魯門雖然說：「在往後各個時期中，政府方面還有許多獲得批准的工作，需要展開，這些都會繼續增加財政上的義務」。但在「新政」上的需要展開的未定工作，無論如何是不會多的。現在，杜魯門就已對退伍軍人的津貼和醫院建築計劃，加以删減；對於新的公共事業的建議，也聲明只限於「那些爲公共利益不容再加

延緩的工作」；對於若干電力計劃也抱同樣的態度等等。

這就再明顯不過了。杜魯門在預算中所暴露的內政外交政策，是更瘋狂更大規模的走上備戰和軍國主義的血腥道路，爲華爾街金融寡頭、大軍火商、黷武軍人服務的法西斯道路。

不打自招的經濟報告

杜魯門在其對美國現在及將來的經濟情況之報告中，是充滿着極力掩飾不掉的灰黯氣氛的。

「整個經濟的生產，比一九四七年高出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這一九四八年的生產增加的數字，絲毫沒有改善美國自戰後以來工業生產的低落停滯的情況。因爲，如所週知，美國的工業生產，在一九四四年的戰時，達到最高峯，自後一年不如一年，到了一九四七年低落到僅及戰時最高水準的百分之八十以下。這是由於軍事定單驟減，美國獨佔資本不能爲了提高人民生活，將其戰時大量擴張的工業生產力，順利轉變爲平時工業的緣故。現在，雖然在一九四八年有馬歇爾計劃的輸出和備戰計劃的刺激，還是不能消除其一蹶不振的頹勢。

報告中還不完全的指出：「一九四八年全年各項事業的投資，均維持在一個高水準之上，農業以外的各項企業所支出的工廠及設備費用，計達一百九十億美元，略高於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所達到的水準。但因成本較高的關係，此種投資的實質數量並不能維持一九四七年的水準」。又說：「對工廠、設備、商品和買客賒欠等投資的公司資金，在一九四八年需要二百六十億美元，較一九四七年減少二十億美元。但對工廠和設備的新投資部份則已減少」。本來，美國在戰後儘管很大部份的軍事工業陷於停頓，但若干適應市場需要而進行的工業的復員和陳舊固定資本的調換，仍曾呈現某種生氣，使大規模工程，特別是裝備的比重，不斷增長起來。但自一九四七年以來，減少投資的趨勢，便已漸漸顯現出來。一九四八年，這個趨勢，竟是更加低落，以致連一九四七年的實際水準也不能維持。這個事實，無疑地反映出美國日益迫近的危機的條件，是更加成熟了。

在形成這個局面的原因中，戰後國內外市場的緊縮，是最主要的；而通貨膨脹的繼續惡化，物價的繼續人爲抬高（不是適應生產力之增高成本之減低而降低價格，反之，爲了獵取高利潤把價格提高了），更加促成危機的發展。

報告中指出一九四八年的失業人數，「仍盤旋於二百萬人的低水準」。這顯然是只指的完全的失業人數（且顯然是低估了），而沒有反映因工時的普遍減少趨勢所造成的半失業人數。這一半失業人數——失業後備軍，是很龐大的，並日在增長之中。據商務部統計局的公報指出：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每週就雇自十五小時至三十四小時的工人，共計一千〇四十萬人，而在十月九日則爲七百二十萬人。

「價格廣泛的上升趨勢，業已中止」。但又指出：「價格的趨勢已更趨不規則，且更具選擇性。金屬與金屬產品、建築材料、燃料及發電原料以及其他耐久品均一致上漲，而若干其他種類的物品則趨下游，尤以農產品爲甚」。「物價不同方向的急劇伸縮（上升與下落者均存在），使我們又面臨一個急迫的調整問題。我們需要調整，以維持整個經濟中最高度的就業及生產水準」。這說明美國經濟的不平衡性與不穩定，已從價格趨勢中充分顯出其日趨嚴重；並由此可知，這一事實已威脅到美國的就業與生產水準了。

通貨膨脹的趨勢，則絲毫未見緩和。「通貨膨脹勢將繼續不斷，增加了對工商業投資的刺激。而物價增加又成了只有比較固定收入的消費者需求上的阻礙。比較起來，在有統計可查的承平年代，消費者的支出在全國總產量中所佔的比例從沒有這樣低過」。

又溫和的承認：「一九四八年消費者收入平均的增加與消費品價格的增加，大約成正比例」（未免過分掩飾了——註）。這就是說，全國生產量雖增加百分之三至四，但消費者的實際收入並無顯著的增加（正確的事實，應該是說，比較起來，後者大大減低了——註）。

但是，儘管物價高漲，生產量相對增加，工人的實際工資一天天低落，而獨佔資本的利潤，卻不斷提高了。「一九四八年的盈利，再度超過以前的一切記錄，且終年在高漲中。公司的盈餘，除去捐稅外，總數約爲二百十億美元，以前在一九四七年的最高記錄約爲一百八十億美元」。我們還要比照一下更早的時期，如一九四六年是一百二十八億美元，一九三九年則不到六十億美元。

其次，在國外市場方面。報告也相當反映了一些事實：「一九四八年物資勞役的出超，較一九四七年要減低得多，其比例爲六十億元比一百十億元。這在另一方面表現了人口的增加，這種增加是支持國際貿易所必要的發展；而且這更表現了出口的減低，因爲外國的購買人缺乏金元向我們購貨，因爲外國對必需品的生產量已續有增加」。馬歇爾計劃的奴役性和排他性，繼續破壞着馬歇爾化各國的購買力和美元資產，同時也使華爾街預期可以藉此支持龐大的美國輸出的美麗希望幻滅了。

國內外市場的不斷萎縮，而獨佔資本人爲高利潤刺激下的生產過剩的趨勢，則日益嚴重化，美國經濟危機是一天天尖銳化了。

備戰和擴張能挽救危機嗎？

正是因爲一九四八年美國經濟面臨着日益尖銳化的危機，杜魯門所選擇的更忠誠爲華爾街服役的道路，就決然不是什麼「新政」——一個比較有效的緩和危機的民主進步的道路，而是更瘋狂的走上備戰和對外擴張的法西斯道路了。

但是，在一九四八年已某種程度的證明這不是走得通的道路，今後卻能夠嗎？

在某一方面說，答案也許是肯定的。一九四八年還是美國備戰經濟剛剛抬頭的一年，今後更大規模的軍事定單可能刺激美國大部陷於半停頓狀態的軍事工業，使其獲得更大的「戰爭景氣」，像第二次大戰前夕的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以及熱烈掀入軍備競賽的「民主國家」那樣。美國今後以軍事援助——武裝西歐，代替半軍事化的馬歇爾計劃的經濟援助，也可能替華爾街在崩潰中的國外市場獲得新的擴張。

但在更基本的另一方面說，答案無疑是否定的。因爲美國的瘋狂備戰，軍事定單和軍事租借式輸出的恢復，只能大量提高華爾街金融寡頭和大軍火商的利潤，而對於其國民購買力及資源物資供應的攻擊，則將更加兇猛。同時，叫經濟財政崩潰中的西歐等國家接受更加超過她們經濟負担能力的備戰計劃，也必更加破壞西歐等國的財政經濟，加速其崩潰，加深其政治危機。這樣，美國就會遭逢到比今日更爲嚴重的與其生產力之增長日益偏離的國內外市場的緊縮，也即是說，將更加使美國倒塔式的經濟畸形發展，日益搖搖欲墜。如果我們再估計到今後美國及世界人民必然更加有力地打擊和擊敗國際反動好戰集團的備戰和軍國主義計劃，那末，美國及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就完全不可收拾了。

因此，美國許多反映華爾街意向的輿論界，當其對新年美國經濟局勢作推測時，廣泛的表現出一片惶惑不安的情緒，不是偶然的。「進度報」紐約特派記者認爲美國經濟「已經開始走向下坡」，該記者還徵引「華爾街日報」的言論，指出目前已可看出美國恐慌的最初徵兆。「華盛頓郵報」在一月三日也寫道：「當我們一跨進一九四九年時，我們可以說：問題不在於是否會發生一種經濟的逆流，而是在於這種逆流會發展到一種什麼程度。」參議員摩萊·史巴克曼和衆議員柏特曼在國會中提出議案，主張授權政府，使它在受到經濟恐慌的危脅，別的措施不能穩定經濟時，應該如何如何。美國全國農民同盟主席柏東在接見記者時，對於這些議案表示贊同，聲稱：我們已處在不穩定的時期中，政府必須準備應付可能發生的任何事故。

美國的繁榮與恐慌分析

充份就業能消滅經濟恐慌嗎？

美・Ralph Peters　葉嘉樹譯

美國總統最近向新國會的報告，指出美國經濟不會發生恐慌，但他所報告的許多事物，却又隱然表示恐慌的必然性。這裏是美國一個進步的經濟學家 Ralph Peters 的一篇分析，載十二月冬季號的「現代季刊」中，對這問題有很深刻的剖視，譯文是改寫的。

美國若干統治集團的腦子裏，至今還以為他們已能主宰世界了。不錯，所有的經濟指數都證明：美國的資本主義正在進入和平時期最高的繁榮。舉個例說，聯邦準備局的工業生產指數在過去兩年間始終保持着一八〇至一九〇的水準（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為一〇〇）。難道這就等於說：「資本主義的矛盾」已經給克服了麼？

應該從羅斯福時代說起。那個時代是根據凱恩斯的學說，認為資本主義一切苦惱都是由失業來的。如果要有充分就業，就必須有相當的經濟活動水準，那是用國民收入來做標誌的。

臨到大戰結束時期，美國許多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發表了許多關於「充份就業經濟學」的研究，所得的結論大體上和這差不多。

所謂「充份就業」，在戰後時期的定義，即就業水準能夠造成功約莫二千億元（以一九四四年金元價值為準）的國民總生產（即國民收入、行莊存款及稅收三者的總和）。即等於六千萬人就業，其中包括一百五十萬的失業者（假定正在換工作），可能還包括二百五十萬軍隊。

像這樣子的分析，最大的問題集中在消費力上。我們是否能夠支出二千億元來購買價值二千億元保證充分就業和充份生產的生產物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新政經濟學家把經濟分為三類：（一）個人消費者，（二）工商組織和（三）政府。三者的支出總和即等於國民總生產。又因為個人消費者的支出是按收入而定的，故其餘兩項因素都被看成戰略性的因素。按照過去的經驗，這些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們認為個人消費的支出最多祇達一千二百億到一千二百五十億。餘下來的七百五十億就是行莊和政府負担了。根據過去經驗，行莊支出每年從來不超過二百億。這樣說來，就算採取最樂觀的觀點，每年個人消費者和行莊的支出不超過一千五百億。那麼，政府開支豈不是要達到五百億麼。

應當注意的是：政府支出五百億，其目的只在達成充份就業，但這是資本家從來就不喜歡的，因為保持大量的飢餓勞動後備軍，即等於壓低工資和提高剝削率的最大保證。

在戰爭中聯邦政府每年支付非作戰物資及勞務的款項，絕不超過五十億至六十億，把各州政府及地方政府的開支加上去，也不過增加七十億或八十億。在另一方面，一九四四年作戰開支却高達空前的九百億。要在平時實行如此巨大的開消，光是社會勞務的增加還是差得遠的，必要考慮許多像TVA那樣的巨大計劃，但那樣的建設却又和資本家的企業直接抵觸。

＊

把美國戰後的繁榮作一簡單的考察，就可以看穿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的若干假定的不確。在這當中，我們看到政府並非一個大公無私的調節者。

讓我們首先檢閱一下戰後美國的大「繁榮」。

戰爭帶給美國兩重的繁榮。首先是，由一九四〇年到四五年，美國的經濟極「佳」（這樣的字眼在歐洲人聽起來是多麼奇怪呀！），其次，戰爭使美國人得不到充份的物資，留到戰後來補購。但是，消費者購買力却是戰後第一樁災難。從戰時最高峯（一九四四）到一九四八年第一季，國民收入中薪工的部份，已經由百分之六六・五降到百分之六十二。一九四八年第一季，工人的實質收入比戰時最高峯跌了百分之二十。出售量（不是質）在一九四六至四八年並無增加過。

消費者購買力雖然下降，但戰後繁榮却依舊繼續着。下表是美國戰後經濟有意義的變化底一個總結：

國民總生產（一九四六至四八年）

單位：億元。

	一九四六	一九四七	一九四八
個人開銷	一四七六	一六四八	一七五〇
國內私人投資	二六五	三〇〇	三五〇
新建築	八九	一一七	一五〇
生產者耐用設備	一二八	一七八	一八〇
商業存貨變化	四八	六	二〇
國外投資	四七	八九	五〇
政府開銷	三〇八	三〇〇	三四〇
（總額）	二〇九三	二三一六	二四九〇

在戰後三年中，國民生產總額已增百分之二十。但必需知道：同期照勞動統計局的消費者物價指數看，物價水準已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四。故個人開銷雖增加了百分之十九，但實際上却落在一般物價增加之後。

存貨流通量在一九四六年曾達五十億高峯。在這一點上，戰後巨大的輸出解救了危機。國外投資（以出超數字計算）在一九四七年增加了約九十億。但這輸出繁榮却反映了不正常的貿易關係，一方面是因世界大戰而來的，另一方面是英國和西歐戰後生產尚未恢復。所以在一九四八年，國外投資估計已減至五十億，這是馬歇爾計劃所建立和保持的水準。

由此可知真正保持目前繁榮的，究竟是什麼因素了。政府開銷一九四八年達三百四十億。這是美國資本主義唯一的救星。

在美國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目前情況下，政府開支一般地被看作維持這一制度的必要因素。但是政府開支裏面只有一種方式，能夠適合大資本的胃口。那就是為準備戰爭的開支。在一九四八年，國民總開支每五元中就有一元作如此的用途。一九四九年大致還不止此。

＊

美國資本主義已經到達了凱恩斯式的充份就業的夢想了。但要維持這種狀態，但必須不斷增加作戰準備。但是這些辦法不但不能消滅美帝國主義的恐慌，而且創造出一種新型的恐慌。因此，戰後美國的繁榮，是沿着蕭條與戰爭之間展開了。這兩端當中，無論那一端都是美國人民的災禍。

羅馬尼亞底教育改革

馬嵐 譯

最近幾年以來，正如在其他新民主國家一樣，在羅馬尼亞，也發生了很多大的變化。而最近的教育改革，却正反映了這些變遷。這一新方針底第一特點是教育底全部國有化。在羅馬尼亞，所有商業性的私立學校，重心組織放在外洋底舊教「懺悔學校」，以及每一個代表不同教派底學校都不再存在了。由於這些機構底教職員與夫設備都被國家接辦，自然，這變化是決沒有減少學校數目底意味的。

雖然許多技術上的困難將妨礙發展教育計劃底卽刻實現，而教育機構底數目，無疑是會增加的。

直到目前爲止，在兩百萬三歲到七歲兒童之中，只有九萬人進了托兒所。這種情況將很快地被糾正過來，不但可以造福兒童，而且更幫助了因工作底緣故而在白天不能照料孩子們底父母。

在過去，國民教育只有四年，現在則延長到七年。雖然法律上規定着國民教育是強迫性的，但過去眞正進入國民學校底孩子底數目却少得可憐，而文盲底數字却極高。將來，入學將強制執行，爲了適應青年人底需要，將按照最新的現代化方法，給人以精神上及身體上的訓練。

倘若我們進一步看看較高級的教育領域，則教育改革底效果將變得更趨明顯。從前，在一百四十萬受過國民教育的青年之中，只有三十二萬能夠升學。唯有富裕階級，才可能把他們底孩子送到中學去。尤其糟糕的是在七百二十所中級學校之中，就有五百六十五所是古典化的舊式學校（其中三百八十五所是法國官立學校型的中學，六十四所國民教育師資訓練學校和一百零六所商業學校等）。而區區的幾所工業學校，也並非在訓練技術工作者，不過是在造就一些小技工而已。

然而，最令人驚愕的，則是在一個農民佔全部百分之八十的國家裏，却沒有一所適當的農科學院，這正說明了舊教育制度之如何的不合時宜，並忽略了國家底實際需要。

進一步看，縱令公共健康是如此敗壞，而護士及產科醫生底訓練所却異常稀少。由於牧人底無知及獸醫學院只有一所底事實，每年有上千頭的牲畜喪失掉了。

研究理論的學院將繼續辦理，但課程底安排則將按照作爲進一層深造基礎底普通知識底實際需要。並訓練托兒所及國民學校底師資。而且，爲了有助於農、醫、護士、工程等技術訓練底中級學校，他們底數目形將減少。而這些學校將在全國不同地區設立起來，專司工業上及職業上需要底助手訓練之責。

所有受過中等教育的學生，都有權深造。這樣，中等學校底教導就會服務於國家底眞正要求了。

這樣一來，所有不進大學的中學畢業生就不致像過去在舊式中學畢業的學生一樣，飽受「古典」課目，而淪爲毫無訓練、對實際工作無一技之長的境地；反之，他們將全部成爲有用之材，適於從事任何有用的工作了。

最後，大學教育也相當改進了。在過去，五萬七千大學生中有四萬四千是學文科的。在唯一的獸醫學院中只有六百學生，有一萬青年在研究法政。由於這一不幸的遺產，數學及其他科學部門底教員和教授乃大感缺少，而律師却過剩起來。

因而，大學就被賦以雙重任務，一方面得造就技術及科學工作和普通乃至實用研究底專門人才，一方面又得造就中學、專科學校及大學底技術和科學師資。

同時，大學程度的專科學校將專門訓練工業上急需底技術人員，並訓練各級學校底技術教師。

此外，另一重要發展則是地點問題底改進，在過去，所有高級的教育機構都集中在首都，在將來，學院及專科將分佈在生產的主要地區，比如，在主要產煤區底耶約谷將設立一所礦業學院，在鐵及其他工礦中心底布拉德將設立一所工礦學校，而在林產中心，一所森林專科學院也將建立起來。

然而教育改革却決不忽視藝術，在五大城市中，藝術學校也將設立。

教育改革已打破了阻止羅馬尼亞人民接近文化及學間底人爲桎梏。同時，過去能享受高等教育的特權階級所造成底劣境，因而造就了一大羣不符國家眞實需要的畢業生，也將隨之消滅。（譯自英國"The Central European Observer"雜誌）

本社出版：

世界知識叢書

書名		基本定價
公民潘恩	（初版）	三〇・〇〇
國會與政府	（初版）	五・〇〇
論馬歇爾計劃	（初版）	三・〇〇
蘇聯看世界	（初版）	二・八〇
美國政治剖視	（再版）	二・八〇
新民主國家論	（三版）	四・〇〇
戰後蘇聯印象記	（三版）	四・〇〇
世界現勢圖解	（再版）	一八・〇〇
戰後世界經濟與政治	（增訂本）	一四・〇〇
豪門美國	（三版）	一〇・〇〇
日本問題讀本	（再版）	四・二〇
東南亞各國內幕	（再版）	四・〇〇
論美蘇關係	（再版）	四・三〇
俄羅斯問題	（再版）	四・三〇

歡迎讀者選購

一週外論輯要

小宜輯譯

共產黨的答覆

毛澤東提出的八項條件，正是意料中事，並不使我們驚奇。這些條件等於要求國民黨無條件投降，就祇沒有用這個字眼罷了。除了要求懲辦戰犯之外，共產黨的要求和他們過去所一貫堅持而被一貫拒絕的要求，在實質上並沒有什麼差別。他們此刻又提出來，祇不過重申過去的主張而已。

顯然的，目前的問題在乎這些條件在談判時能修改多少。爲全國最終幸福着想，雙方最好想出一個折衷辦法來。中國之需要和解，莫過於今日。現在就看雙方有沒有偉大的政治家能夠緊握這機會了。（一月十九日字林西報）

毛澤東的聲明

毛澤東猛舞鐵耙，左打委員長，右擊山姆叔叔。看來一切都非常辣手。

有些人抱着希望，以爲共產黨的和談條件是先開高價，在講價時好佔便宜。但是這種理論依舊不能解答基本問題：目前國民黨憑什麼來討價還價呢？

過去南京有的是時間。現在時間快完了。假如委員長早些時候就引退，留下的人還可以和共產黨辦交涉。現在還留下什麼可以講價的呢？我們眞想不出來。

毛澤東的第七項條件要求「廢除賣國條約」，特別提到中美之間現有的條約。這要求完全是空口說大話，不屬於和談條件的範圍，應由未來政府作爲外交問題檢討。我們所以這末說，是因爲相信今天，尤其在中美之間，沒有所謂「賣國條約」存在。這種事情應該審愼研究，不應作爲和談的條件。顯然的，共產黨有一種模糊的觀念，以爲美援的唯一目的在於支撐南京政府，而且這種支撐是有代價的。假如他們肯費心把事實研究一番，他們也許會冷靜下來的。

毛澤東也和通常的業餘外交問題專家一樣，把宣傳和目標混爲一談了。他要求的實際上是無條件投降。也許最好還是使事情簡單化，別把對外條約等問題牽涉進去。對於那些事情，共產黨所曉得的，也許未必如他們想的那般多呢。（一月十七日大美晚報）

中共的和平條件

共產黨對於蔣氏和平試探的答覆，固然並沒有出於意料，但是中國內戰能以和解作終結的這個希望是完全消失了。

毛澤東的八項條件，合起來說等於要求國民黨無條件投降，由共產黨獨霸中國，取而代之。

就西方各國說，毛澤東的哀的美頓書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他對於一般西方國家，特別對於美國的惡毒懷敵意的態度。毛澤東指責國民黨有執行「賣國外交」之罪，認爲接受美援，等於「出賣中國全部主權」。因此他要求「廢除賣國條約」，表示這是特別指中美間全部協定而言的。

就毛澤東的聲明來說，我們顯然很難找到國共談判的基礎。同樣顯然的，共產黨的勝利，將使我們面對一個高傲懷敵意的赤色中國。祇有白日作夢者，才會看不見擺在我們前面的一個冷酷的遠景。（一月十七日華盛頓星報）

蔣氏的引退

自從共產黨在中國內戰中轉入絕對優勢以來，南京上海和其他國民政府控制地區要求和談的壓力，也愈來愈高了。

不論在中國或外國，一般人都以爲蔣委員長是國共和談的主要障礙物。

許多人以爲假如委員長能夠表現自我犧牲的政治家風度，他應該馬上辭職。一旦委員長引退，南京政府由一個比較不以個人地位而以人民幸福爲重的人主持，國共就有和解的可能。假如當年實施憲政時委員長能夠實踐諾言馬上引退，爲他自己的名譽計，爲中國幸福計，一切都會好得多了。但是委員長不肯這麼辦。不管別人的反對，他硬要參加競選作總統。他成爲中國人民的聲名就一落千丈。自從那時候起，他的負担，也成爲在他主宰下的政府的一個負担。

可是我們應該認識清楚，蔣委員長如果辭去，南京政府首長和軍事統帥之職，至少在目前的情勢下，並不能有益於中國的和談。

欲求國共和解有希望，必須雙方軍力均等。今天這種軍力均等的形勢並不存在。如果南京的軍隊沒有力量阻止共軍席捲天津、北平、南京和上海，國民政府事實上就沒實力和共產黨講價錢了。

在另一方面，假如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等認爲勝利已經在握，他們就很難同意談和，給反共份子一個喘息的機會，讓他們重建力量，繼續作控制全中國的鬥爭了政權，就會着手肅清全部敵人的。

就共產黨「懲辦戰犯」等條件來看，一旦他們掌握

在這種情形下，講「談和」實際上完全是瞎說。就這一點講，也許蔣氏並不十分錯呢。（一月十八日大美晚報華盛頓通訊）

新中國出現了

中國正走向共產主義，因爲人民已經失去了抵抗的意志。有三十年來，中國人民在戰亂和貧困中討生活。現在他們似乎已經不惜以任何代價求取和平。

他們並不是贊成共產主義統治。但是顯然的，他們認爲不論誰勝誰負，結束戰爭更爲重要。他們要從事建設：增進人民健康，改善教育，和貧窮作戰，改革農業制度。

蔣氏敗於共產主義，因爲他在執政時期從不曾爲解決人民基本問題而努力。現在他大勢已去，無法挽救。幾十億的美援都虛擲了，再要用幾十億來阻止歷史的前進，已經是太遲了。

那末怎麼辦呢？美國人決定丟開中國不管嗎？我們不能夠退回孤立主義。東方的安定與和平，和我們有極大的利害關係。我們不能漠視這事實。

因此我們就承認已經失掉中國，把它丟開，着手建立日本，使她成爲堅強的軍事堡壘？華盛頓軍部方面似乎已經朝這方向走去了。

美國擊敗了日本的軍力，但是在三年之後她又努力重建日本軍力，這該是多麼辛酸的諷刺啊。

我們根據什麼事實斷定日本一旦重建之後，就會聽從美國指揮，爲美國所用？日本全部歷史都指示一旦她恢復了軍事霸權，就會利用這地位努力實現她的侵略野心的。

重建日本會使我們失掉太平洋上其他一切盟友。到頭來連日本都不會做我們可靠的朋友。

我們只有一個合理的政策可採取。那就是，雖然我們不贊成新中國的政治方向，我們還是承認她，準備和她共處。

那些把共產主義和極權侵略主義視作同物的人，會

起來反對說，建立一個將來會向我們進攻的赤色中國是愚蠢的。

可是有理性的人假如肯冷靜地考察事實，就會相信中國很久都沒有侵略別人，在長遠的將來也不會有力量從事侵略。中國是一個人口繁盛的農業國家，沒有重要的工業發展，有許許多多嚴重的內政問題急須解決。任何企圖動員中國從事侵略戰的共產黨政權，必然會和南京政權得到同樣的結局的。

假如我們需要的是朋友——而欲推行成功的外交政策，不能沒有朋友——那末我們應該痛切地覺悟，我們不能夠把別些國家純粹當作軍事戰略中著圍棋的棋子用。

中國是人民——不是基地。假如我們把這事實牢記在心頭，我們就可以謀取合理的辦法和新中國合作了。（一月十九日芝加哥太陽時報）。

本欄文字，純爲外國人對我國局勢議論的介紹。絕不能代表本刊的見解——編者

台灣：避難之島？

英國"Economist"周刊

——譯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該刊

多少時候來，傳說着蔣總統和他的政府，將撤退到台灣島上去，如果他們不能繼續抵抗共軍的話。把台灣建立爲基地的步驟似乎已在着着進行，政府高級官員據說正在把眷屬送到那面去。在中國歷史上，藉台灣作最後抵抗是有過先例的，當滿洲人在十七世紀席捲全中國的時候，失敗的明朝遺臣，就曾於本土陷於北方征服者之手以後，在台灣扼守了二十年之久。但這一先例却並不保險可靠，滿洲人到最後還是取得了台灣，因爲那時的守衞者只能完全倚靠當地的資源，而難望通過重洋的援助。

當大陸本土軍事崩潰之後，在台灣樹立反共政權的希望，當然是根據了這樣的事實：台灣是一個島嶼，沒有船舶和海軍的掩護就不能侵入。這必須假定是中國的海軍仍將忠於政府，或美國的海軍鑒於台灣對美國戰略上的重要性，將出力保護，以阻止共產黨的侵入；如其這些條件不能完全具備，那台灣就並不比中國的其他部份易於防禦。就它在亞洲邊沿從日本到菲律賓的一連串島嶼中的地理位置說，台灣對於美國海軍部顯然有着很大的利益；而且，那裏還有日本人修築得很好的飛機場，還有庇斯坎杜列斯（Pescadores Is.）島上鄰近的瑪孔港（Makung）以前是日本最重要的海軍基地之一，該島的最南端正是指向菲律賓的前哨。假如共軍佔領了南京，美國仍繼續承認台灣的中國政府爲合法政府的話，美國顯然將用海軍支持它而使這個島嶼不致落入反美政權的手裏。在另一方面，假如華盛頓決定承認了以共黨爲主的南京聯合政府，那末，依照國際法說，台灣任何分離的政權就成爲叛逆的政權，美國人將避免支持它；這樣，共產黨就可能接收了台灣。

除了海軍保護的問題之外，台灣的一個避難政府還有經濟資源的問題。台灣自一九四五年復還中國後，雖然搞得一場糊塗，但它在今天仍是中國對外貿易上主要的資產。它的天然資源固然算不得怎樣豐富，它的工業和農業的潛力，却已由日本人加以有效的開發。在今天，它對外國輸出的總值，約佔中國全部輸出的十分之一，它的輸出量，僅次於上海的輸出量。價值是每個月不同的，主要視糖的輸出量而定；本年（一九四八年）輸出的總額約值二千一百萬美元以上。這個孤島對中國的用處，可從台灣的外匯分配額看出來，今年（一九四八年）最初兩期的外匯分配額計各爲二百七十七萬七千八百美元及一百九十五萬七千一百美元。台灣今年（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對大陸本土的貿易，出超計達一千三百五十萬元。

就價值說，台灣對外國輸出的四分之三爲糖，次要輸出爲茶、三和土、鳳梨及酒精（一種糖的副產物）。當日本人統治時，台灣有糖廠四十家，產量最高達每年一百四十萬頓。戰爭結束時只剩了八家糖廠完整無損，其餘的都已炸毀或荒廢。而且，由於肥料的缺乏，甘蔗的生產也大大下跌。一九四六年僅產糖三萬噸，一九四七年十萬噸。今年的生產目標預期爲二十六萬八千噸，一九五〇年爲八十萬噸。

台灣此外重要的出產爲穀物。日本人曾用改善灌溉和施肥的種種方法，竭力擴大穀物的種植，他們企圖以此來達到日本帝國糧食自給的目的。在戰爭以前最高峯的一年（一九三八年），台灣曾產穀四千八百七十一萬一千四百五十二「布歇爾」（bushels等於八加倫），其中有一半運往日本。所有可耕地都在耕種中，但日本人仍希望以更科學的方法來增加生產。台灣每年的收穫量雖高於中國別地，但仍較日本的爲低。一九四六年的產量爲三千〇九十七萬七千八百十四「布歇爾」，一九四七年爲三千八百九十三萬零零三十二「布歇爾」，今年（一九四八）可望達四千二百八十七萬八千「布歇爾」。台灣的穀產是很少合法輸出的，走私運往大陸本土却很多。

在提高甘蔗和穀物生產的努力中，主要的限制因素，是肥料的缺乏。在一九三八年，台灣曾用了六十五萬零六百七十五噸的商業肥料，包括二十一萬三千噸的豆餅。去年（一九四七），當局僅取得輸入的化學肥料八萬噸，豆餅四萬噸，本地製造的肥料三萬噸。到今年（一九四八）八月底止，僅輸入化學肥料四萬四千噸。台灣的經濟澈底地依附於日本的經濟。它在經濟上雖較戰前日本爲落後，但無論在農業上和工業上，都遠勝中國。肥料的缺乏，清楚地說明了當一個區域從一個經濟制度脫出而依附於另一經濟制度時所不可避免的脫節的結果。據可靠的報告，台灣的肥料需要，將由美國援助計劃來加以補救。

大部份的日本大工廠，現均爲省政府及全國資源委員會聯合經營着。工廠的管理有着若干美國顧問的協助，在糖廠方面，更有日本的顧問。（其他留在島上的日本人，除了台灣人的日籍妻子外，尚有台灣大學的日籍教授和講師三十人。）資源委員會還單獨經營着三種企業，即：高雄的煉油廠，基隆的金礦、銅鑛和高雄的製鋁廠。（仙舟譯）

Monda Kulturo　World Culture
Culture Mondiale　Weltkultur
Cultura Mundana　Мировая Культура
Cultura Mondiale　Wereldcultuur

世界知識　第十九卷　第五期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第四五七號　上海市社會局核准登記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六二號
上海本分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五洲書報社　上海雜誌公司

本社叢書一律按基價八倍計算

書·的·世·界

「日韓紀行」

葵軍

Japan Diary, By Mark Gayn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縱目世界的書市，我覺得眞正能夠忠實報道戰後日本和南韓情況的，眞是寥若晨星。最近，國外一位朋友給我寄來一本美國名記者蓋恩（Mark Gayn）寫的 "Japan Diary" ——姑且譯爲「日韓紀行」吧，翻閱一遍，深以爲是難得的好書。

這是作者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七日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一日這段時期內訪問日本和南韓的忠實的見聞錄。從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由美國軍政府所放下的「鐵幕」後面，日韓人民如何在過着雙重壓迫的生活。

本書也可說是作者對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控訴。書中沒有一頁不洩露了美國對日韓政策的腐敗、奸詐、殘忍、對盟國的欺騙和蔑視人權的事實——這一切所作所爲，目的都無不是企圖使日本變成美國反蘇戰爭時的前哨。

作者對於執行美國日韓佔領政策的人員，從杜魯門政府、麥克阿瑟一直到東京的盟總官員，都作了毫不容情的指責。但這些指責，沒有一字一句是空論，作者的控訴完全有事實的根據，他把「被告」的姓名和醜惡事實發生的日期，都原原本本地告訴了讀者，因此他們是無可抵賴的。

美國人民有權要求根據本書所列舉的事實澈底審查美國政府對日韓的政策。因爲這些政策和活動現在必須結束了，否則美國人民將無可避免地捲入反蘇戰爭的漩渦。

＊

這些政策的命令都發自杜魯門政府的這個事實，可由下列引據得到證明：

「指令是在四月中由『國家安全委員會』（按這是美國決定軍事、外交及各項重要事件的一個特別機構，由國務院、陸海空軍負責人及總統等聯合組成）發送給麥克阿瑟的。

「華盛頓的命令根據了下列的原則：

美國固然贊成最後在日本建立一個共和政體，但日本人民却顯然贊成帝制。因此，華盛頓授令麥克阿瑟將軍使日本繼續實行君主立憲政體，而藉此乃得保全帝制。

「對帝制的直接攻擊，勢將削弱民主份子而相反恰加強了共產主義及軍國主義。由此，盟總受令繼續祕密地使天皇人性化和權威化。

「這是祕密，不得讓日本人民知道。」

像這一類的命令都是經過弗勒（Benner Feller）覆核後所發佈，他是胡佛的朋友。

這裏是蓋恩所寫關於這位弗勒將軍的事：

「天皇，」他告訴一個記者說，「並不比羅斯福更能稱是一個戰犯。……」

弗勒認爲蘇聯的勢力正在擴張，可能甚至會達到不列顛海峽。換句話說，俄國人正「密密層層地圍住了白種人，他們只企望着英國的領導。斯拉夫人正隨同共產主義一同光臨，而只有盎格魯·薩克遜是唯一能拯救西方的民族。」

弗勒的結論照作者所引的是：「只有一次新的戰爭」纔能拯救「白種人的搖籃」。

＊

美國政府中那些入了戰神之黨的官員們，他們的目的是要把日軍用在反蘇反共的戰爭中，這個企圖可從麥克阿瑟一個接近的幫手魏樂比將軍（Gen. Willoughby）向一夥日本獨佔資本家的演講中看出來：

「日本軍是第一流的軍隊：精於執干戈。固然有人聲訴日軍殘暴。但當一個軍隊背水苦戰的時候，這是可以理解的。

「我們剛對付了德國的警察國家。我們必須留神一個已經在歐洲崛起的新警察國家。（按係指蘇聯）。」

這個觀念無疑是美國佔領軍所以使整肅日本政府這件工作遭到失敗的原因。美國推說日本拒絕進行任何重組日軍核心的事情，這一點在本書中是被作者澈底揭露了。

美國報紙和杜魯門政府一直要想使美國人民相信蘇聯破壞了和她的戰時盟國所訂的協定。但是作者却指出誰纔是眞正的破壞者。

一九四六年五月廿四日那一天，盟總全體官員集會討論如何整肅日本經濟上的戰爭罪犯。這一個措施是由杜魯門、史太林所共同簽署的波茨坦宣言中所規定必須履行的。

但是一個派駐盟總參謀部的國務院官員叫皮雪普（Max Bishop）的，說道：「波茨坦宣言並不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文件。」

另一個叫克萊斯威爾少校（Col. Creswell）的聲言說：「滾他媽的波茨坦條約，現在已經是時候了，當我們要想有一個強大的日本的時候。」

這裏所引的幾段只是本書精彩部份的一二節而已。在這本書中，作者申述美國佔領軍如何破壞罷工、蹂躪人權、箝制言論和檢查新聞（這不僅對日本報界，就是美國在日本的通訊人員也是同等待遇）。他把美國官員的種種腐敗給予實際的例證。他揭露美國佔領軍如何在日本和南韓縱容最臭名昭彰的反動份子。